

# 貌似一样怜才曲，句句都是断肠声

## ——《李宗恩先生编年》读后

作者：章诒和

(上接5月11日 第B4版)

### 九、无望

李宗恩是个一个例外！大限在即，他没给中共的领导写信，偏偏给农工民主党组织部寄去一份思想总结，还缴上全年党费十七块两毛八，信里特别说明：“1961年第八期“前进”（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机关刊物）及1962第一期学习资料均陆续收到，以后如寄昆明六合村昆明医学院图书馆李宗恩收更为直接也。”不可思议，即便是发生在今天的2016年也不可思议！我从热泪涌出到伏案大哭，哭什么？哭一个违背常情常态常规的例外。李宗恩的人生一路狂跌，从名医到右派，从京都到边陲，从中年到暮年，从盛年到衰危，困蹶流离，天上地下，他竟守着一份对民主党派的信赖，偏偏这个政党最对不起他！

这种横亘岁月的政治抉择和情感是从哪里来？何处是因由？我无法回答。也许，是因为他长期接受西方教育所形成的独立意志；也许，是由于现代医学所给予他的某种思维定势；也许，是出于不同凡响的李氏家族的遗传基因，使他得以抗拒“群体灵魂”对个人灵魂的吞没与剥夺。是这样吗？也许还因为他不懂政治，不懂社会，不知进退，不明利害，仅仅是出于人情人性。

李宗恩最后做的一件事是安顿妻子。夫妻同属一条命，今后是她替他活着，所以必须为妻子的今后着想。他立即动笔，分别给三个老友孙邦藻、林宗扬和胡正祥写了内容相近的信函，这是李宗恩唯一可以安顿妻子的方法。信是用英文书写的，清简凝重，从每个字的后面飘出淡淡细雨，阵阵寒风。

这里将其中的一封，抄录如下——

My Dear Johnson:

I fully expect to see you in person before very long but that is not to be. By the time this reaches you I shall be in the land of limbo. I shall for my lad on for there are things I do not understand but I do admit that there is a lot to be said for the new regime and I have no complaints.

Jean, my wife, will live long after me. I am asking you, C.H. Hu + C. E. Lin to be her advisers. If any time she has occasion consul to you I am sure will give her your wise counsel.

Adieu, my friend  
Yours always

译文如下：

亲爱的Johnson（孙邦藻——作者注）

我以为一定会亲眼很快见到你，但是已经不可能了。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应该到了灵魂安息之所。我应该说，有很多事情我不明白，不过我承认新政府做了很多事。我无悔无怨。

我走后，Jean，我的妻子，还将会继续生活下去。我请求你，胡正祥，和C.E. Lin为她的顾问。如果她有时咨询你们的意见，我相信你们一定会给她明智的建议的。

再见了，我的朋友，永远是你的，

从容入世，清淡出尘。李宗恩临终前发出的三封信，让我们看到一个高贵的灵魂：一方面是至死保持着爱的能力，另一方面是选择死亡的平静。

信函寄出不久，李宗恩悄然离世。来则安然，去则泰然，一个气度磅礴、宽仁恭俭、缜密精致的人，在荣耀和耻辱中穿行六十八载之后，倒在险恶而干枯的路上。一场死，无声无息，不惊不怖。

李宗恩病危之际，昆明方面曾向北京打了报告。中央（据说是周恩来总理）让李宗恩的长子飞往昆明，并指示：如有可能的话，将其接回北京救治。但儿子接回来的，是父亲的一捧骨灰和悲痛欲绝的母亲。

李宗恩出生地常州青果巷。这条小巷人才辈出，有名有姓、有头有脸的，足有一百多人。但是不管你查阅“百度”，还是查阅当地编印的材料，就是没有李宗恩。

所以，我要写李宗恩。“拂尽了红尘黑雾，还他个朗月清风清。”

2016年1月—7月

章诒和 写于北京守愚斋

附件：

玛丽·布朗·布拉克女士讲话全文如下——

“做为现任中华医学会会长和一个历史学家，我很荣幸能参加这次有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PUMC毕业生和教师以及李宗恩亲属参加的李宗恩院长纪念会。

从二十年代至五十年代初，李博

士（医生）的事业与中华医学基金会密切相关。早在二十年代初，李宗恩是第一位由CMB (China Medical Board, 中华医学基金会) 聘请加入PUMC的以外籍教师为主(faculty) 的中国人。他因为拥有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医学博士学位，且具有很好的专业背景而备受学校重视。与后来加入的几位出色中国教员一起，他们为协和医学院培养了第二代和第三代教师。

他早年从事传染病特别是黑热病研究，他对黑热病利什曼原虫的生活史进行了从实验室到野外现场的深入研究，他的研究成果使1950年代黑热病的根治成为可能。他是黑热病研究的光辉先驱和典范。

李宗恩是一位爱国者和杰出的学院领导人。抗日战争爆发之初，CMB曾希望他能留在北京，以便在美国的庇护下把协和继续办下去，但是李宗恩谢绝了这一邀请，他决心接受聘请到西南大后方去创办贵阳医学院，为国家、为抗日战争做贡献。

毋庸赘言，在当时条件下创办一所医学院有多么艰巨，他却在这极其艰苦的时期为中国培养了几千名医生，获得这一成功是十分艰难的。从他给CMB写的信中可以看出，他在贵阳医学院的这段成功经历改变了他对PUMC的看法，重新审视了PUMC在中国医学教育中起的作用，认为PUMC的医学教育脱离了中国的贫苦大众的需要，应该成为中国的医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他的这一医学教育理念成为日后CMB聘请他担任PUMC真正的首任中国院长的主要原因。虽然刘瑞恒是前任院长，但实际上是美国人掌权。

抗日战争结束后，对于PUMC究竟是否应该复校，以及能否复校，在美国



李宗恩的素描，弟李宗津1954年3月4日作

和中国都存在着争论。学校的楼里空空如也，学生和教师都离开了，政局不稳定、内战烽火已经燃起、通货恶性膨胀。据说美国方面听说，一位有些重要影响的中国领导人说过，中国需要PUMC，CMB从而下决心恢复协和。关键是，必须选一位医学院领导人，他既要有办好医学教育的能力和经历，又要有卓越的医学科学研究背景，CMB认为，李宗恩是理想人选。

李宗恩不负众望。协和于1947年复校，当时的教员大部分是中国人。他重新构建了协和，保存了协和的教育理念，倡导了协和精神，维持了协和追求卓越的教育标准。在五十年代初，协和经历了一个困难的政治过渡时间，他和他的家人也都经历了很多磨难。

我们有幸今天在这里缅怀他。”

——完——

( 本报经作者授权刊载。 )